



中國文化 發展史

總主編
龔書鋒

宋元卷
王育濟等著

山東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國文化 發展史

总主编
龚书铎

宋元卷

王育济等著

山東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发展史. 宋元卷/龚书铎主编;王育济等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8—7934—2

I. ①中… II. ①龚… ②王… III. ①文化史—
中国—宋元时期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8006 号

总 策 划/陆 炎
责任编辑/赵燕瑚
装帧设计/石 径

中国文化发展史

宋元卷

龚书铎 总主编
王育济 等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33.25 印张
字 数: 5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7934—2
定 价: 83.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9—2925659

目 录

引 言 宋元时期的历史与文化	/ 1
一、宋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空间	/ 2
二、辽夏金文化发展的历史空间	/ 14
三、元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空间	/ 17
四、外来文化的融入与宋元文化的发展	/ 31
五、宋元文化的历史地位	/ 33
 第一章 宋元文化的区域发展	/ 39
一、中原文化的繁荣和萧条	/ 40
二、文明重心的东南文化	/ 51
三、发达昌盛的巴蜀文化	/ 61
四、岭南文化：汉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	/ 69
五、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	/ 74
 第二章 学校教育与科举文化	/ 81
一、宋代的学校教育	/ 82
二、南北兼容的辽、夏、金教育	/ 91
三、元代的文化教育	/ 102
四、宋元时期的书院教育	/ 111
五、宋元时期的科举制度	/ 118

第三章 气象博大的“理学时代”	/ 130
一、儒学的变革和理学的产生	/ 131
二、从“五星聚奎”到“程门独盛”	/ 139
三、如日中天的朱熹理学	/ 157
四、象山心学和朱陆分争	/ 166
五、理学北传和朱陆合流	/ 172
六、理学在社会文化史上的意义	/ 178
第四章 璀璨夺目的宋元文学	/ 182
一、盛极一时的宋词	/ 183
二、宋代的古文运动	/ 202
三、宋元诗歌的成就	/ 210
四、独树一帜的元曲	/ 231
第五章 绚丽多姿的宋元艺术	/ 248
一、不拘一格的绘画艺术	/ 248
二、风格多样的书法艺术	/ 271
三、异彩纷呈的音乐舞蹈	/ 275
第六章 继往开来的宋元史学	/ 282
一、宋元史学的发展特点	/ 282
二、史馆与官修史书	/ 287
三、几部划时代的通史著作	/ 300
四、大型类书的编纂	/ 314
第七章 宋元时期的语言文字	/ 318
一、小学的变革与发展	/ 319
二、民族文字的创制	/ 332
三、文化典籍的翻译和语言的规范化	/ 340
第八章 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	/ 344
一、宋元时期科技发展的社会动因	/ 344

二、宋元时期科技主要成就 / 348

第九章 宗教文化的兴盛 / 381

一、佛教的流行 / 382

二、两宋道教的发展 / 390

三、金元之际的太一道、真大道和正一道 / 395

四、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在中国的传播 / 402

五、全真教的创立和早期发展 / 409

六、全真教的鼎盛 / 415

七、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及理论建树 / 421

八、全真教的影响 / 430

第十章 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 / 436

一、衣冠服饰的流变 / 437

二、饮食习俗 / 445

三、居住习俗 / 458

四、婚姻习俗 / 462

五、丧葬习俗 / 471

六、节日习俗 / 477

第十一章 宋元文化的对外辐射与交流 / 487

一、宋元文化对外辐射的途径 / 488

二、宋元文化在东亚的传播 / 493

三、宋元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 / 506

四、宋元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回响 / 510

五、宋元文化对欧洲文明进程的推动 / 513

六、宋元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受容 / 516

主要参考文献 / 519

后记 / 527

引言

宋元时期的历史与文化

宋元时期，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曲折的变化，从而对这一时期的文化产生了广泛复杂的影响。就总体而言，宋朝是中国传统社会高度成熟的时期，烂熟之中包蕴和生长着新的社会历史因素，以至于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将宋代断之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与宋并存的辽、夏、金及元王朝，则是由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其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宋朝。它们对中原地区的冲击，尤其是金、元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一方面为迟暮的中原社会注入了游牧民族的某种生机和鲜活的蛮力，另一方面，又明显地延缓了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步伐，甚至若干已经为中原社会历史所超越、所淘汰的政治、经济体制在金元时期又有明显的恢复和强化。历史的曲折发展，使金元王朝呈现出迥异于两宋社会的历史风貌。可以说，宋元文化正是在这风貌

迥异的两大历史空间的变幻中发展和切换着、繁荣和积淀着、碰撞和交融着，展现出野火春风般的文化韧性和百川归海般的文化气象。

一、宋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空间

宋朝 960 年建立，以开封（今河南开封）为首都。1127 年政权南迁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1279 年被元朝灭亡。习惯上称 1127 年以前的宋朝为北宋，1127 年以后的宋朝为南宋。北宋直接统辖的疆域政区，东南至海；北以今天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界；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流域与西夏、吐蕃接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与吐蕃、大理接界，以广西与越南接界。疆域面积不及汉唐及后来的元明清。南宋直接统辖的疆域政区，北以淮河、秦岭与金接界，东南、西南与北宋相同。

公元 960 年，当时正担任后周禁军统帅的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王朝。“陈桥兵变”基本上是一次和平兵变：没有喋血宫门，更没有烽烟四起，几乎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功，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①。这其中，当然有兵权与实力威慑的结果：泰山压顶，自然龙蛇难争，卵石不敌，少有冒死抗争者。但是，兵权、实力、绝对优势等等，只能保证兵变的最终成功，至于以什么方式成功，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决策者的谋划水平和政策识见。从“陈桥兵变”的整个过程看，赵匡胤不仅一开始就反复“严敕军士，勿令剽劫”，而且还通过若干具体细密的措施控制局势，最终保证了兵变入城时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由此赢得了民心，“都城人心不摇，四方自然宁谧”^②。《邵氏闻见录》卷七载：

先是，京城居人闻上至，皆大恐，谓将循五代之弊，纵士卒剽掠。既见上号令，兵士至即时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骚扰，众皆大喜……满城父老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践祚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

① 黄仁宇语，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宋太祖赵匡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版。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点校本。

陈桥兵变虽然也是“以兵威强制天下”，但与五代其他的兵变相比，的确又有很大不同。它的背后凝结着更多的理性和人道，含蕴着一种对社会、对百姓负责的政治良知。时人正是从这种理性、人道、良知中感受到了希望：“以兵威强制天下”的历史正在结束，天下将由分裂战乱而走向太平。

而当时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也朦朦胧胧地察觉到某种相关的信息。宰相李昊奏报蜀帝曰：

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战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①？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此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了。如苏轼、范仲淹、朱熹等众多文化名家，都对“宋氏启运”过程中的理性、人道、良知予以极大推崇，认为“祖宗以仁义开国”，“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国初便知崇礼义……已自胜如唐人”。并明确地把“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归结于陈桥兵变时的“不嗜杀人”，“得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故天下与宋”^②。明清之际的大学者王夫之，由于摆脱了“本朝情结”，因而又有了更为客观、也更为深刻的认识：

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沉浮，姓字且不闻于人间……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惧者，惻怛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兴，怵然而不昧……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寢衰寢微，以消释于无形。盛矣哉^③！

王夫之既不避讳赵氏起家低微和得国之际的“非常”之手段，又能以达观豁朗的态度，烛照出赵宋开国过程中的理性、良知及其意义：惧、慎、俭、慈、和、文，无一不是理性与良知的体现。起家低微的赵氏，正是以这种理性和良知，在“百年嚣陵噬搏之气”中营造出一个宽仁宁谧的立国氛围，从而开启了唐宋之际天下由乱而治、由分而合的根本转机。其意义之大，非“盛矣哉”不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引苏轼等人语；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 王夫之：《宋论》卷一，《四部备要》本。

足以状之。

这种文明理性的开国气象，不但体现于“陈桥兵变”中，也表现在如何处理开国功臣这个传统政治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宋初却选择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这样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文献记载得那样简单和戏剧化，自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领，即被解除了兵权，却又同皇帝保持着亲密关系，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其所造成的“文化效应”，其所形成的“祖宗家法”，的确可以影响和决定一个王朝的基本特点。如果将宋朝开国之际的“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和“杯酒释兵权”等等与两宋政治的某些特色联系起来考察，自会发现更深一层的意义。关于两宋政治的特色，宋人已多有总结。如邵雍、二程、范仲淹等，曾将“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与“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未尝杀一无罪”等等称作“本朝超越古今”的“盛德之事”^①；蔡确、吕大防等，则把“百年不诛大臣”，“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与“祖宗家法”联系起来，认为“三代之后，惟本朝所立家法最善”^②。苏轼在论及本朝的言论自由时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并认为这正是“祖宗深虑”所致^③。南宋名臣留正则更以“自古所无者三”（邵雍、程颐等文化大师等则有“自古所无者五”之类的说法）来标榜宋代政治：

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改肆，一也；祖宗以来，传世仁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

①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八；朱熹编：《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等，《学津讨原》本。

② 参见徐规：《宋太祖誓约辨析》，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③ 苏轼：《苏轼文集》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①。

“自古所无”云云，自然不免夸张，但也的确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城门，以暴登基，无疑多了一些理性和人道；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之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让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因素在消减，理性、人道、文明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宋代政治的这些变化，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而这种进步又为宋代文化的具体发展营造了一个自由、净朗的空间。陈寅恪先生谈宋代文化时曾有两论：一则曰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天水一朝（宋朝）之文化为民族文化之壮丽瑰宝^②；一则谓宋代文人言论是最自由的^③。这二则议论正可互相发挥，以呈示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底蕴之所在。

与政治理性相辅而行的，是赵宋王朝持之以恒的重文政策，《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赞论》曰：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

宋代的重文政策，既表现为“人君”的“尚文”、“典学”，又表现为“擢科”即科举制度的高度完善和广泛推行。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制度发生了很多变化。一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规范化，基本上以诗赋和经义为主。二是“殿试”成为制度，使考生均有机会直接成为“天子门生”，以提高读书中举的荣誉感。三是考试规程更为完善，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出题、评卷、定等办法和考场规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② 陈寅恪：《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③ 陈寅恪：《论〈再生缘〉》，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则，形成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四是应试对象逐渐放宽，取消了隋唐时期考生的身份限制，工商异类和僧道归俗之徒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五是录取名额大幅度增加。唐代每科取士不过 20 人，而宋代太祖时每科已达 90 人，太宗时每科 500 人以上，共开八次，登第者达 7000 人，真宗时开科 9 次，取士 5000 人；仁宗时开科 13 次，取士超过万人。六是进士授官十分优渥。一旦科举中第即释褐授官，“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这种完善的科举取士政策，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阶层读书入仕的热情，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言：“这种种因素的具备，遂使每一个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都要令其子弟去读书应考，争取科名。科名虽只有小部分人能够争取得到，但在这种动力之下，全社会却有日益增多的人群的文化素质得到大大的提高。因此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度在两宋期内所发挥出来的进步作用，所收取到的社会效益，都是远非唐代之所可比拟的。”^①

就传统社会所能达到的限度而言，宋代科举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达到了极限，是中国科举史上的黄金时代。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宋代，举凡第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无一不是科举出身，而且往往是一举高中；而明清时期则几乎相反，举凡第一流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除外），几乎全都不是科举进士出身，个别得中者，也往往是在屡挫之后（如王阳明，三次方才得中）。两相对比，宋代科举制的完善与合理及其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十分明显了。科举不但招揽文化人才，同时又通过促进人才的成长而推动文化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综观整个中国古代史，北宋一朝是政治、经济、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及至自然科学等各方面杰出人才最密集的时代。仅以仁宗前后几十年时间论，其出类拔萃、彪炳史册者不下数十人。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晏殊、宋祁、曾巩、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蔡襄、李公麟、苏颂、沈括……都在各个领域内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此密集的人才群涌现于 11 世纪的中国，绝不是偶然的。他们尽管出身、贫富、专长各不同，但全都是科举出身^②。

① 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载《历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

② 金净：《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中唐以来，从“安史之乱”到“藩镇割据”再到“五代十国”，中国曾长时间地陷入分裂战乱的状态。宋朝建立后，一是消灭了“五代十国”中的各个割据政权，基本上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二是从制度上清除了中唐五代以来政局动荡、分裂割据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对中唐五代以来从生产关系到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变化加以总结、规范和确认。宋太祖、太宗两朝，主要是围绕着后两个方面进行军政体制建设的。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种种举措，也成为“祖宗家法”，构成了两宋三百余年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后世的变动也没有突破这一大的框架。

在军政体制上，一方面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针对中唐以来由于地方军人势力的膨胀而造成的中央对地方的失控局面，实行“强干弱枝”的方针，收夺和限制地方的权力，“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同时选派大批儒臣以朝臣的身份挂职到各州县任职；另一方面，调整皇权与文武百官（尤其是高级文官和武将）的关系，针对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兵骄将悍”的局面，实行“分化事权”的方针，分散、限制、牵制文武百官的权力，以加强专制皇权。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推广，官员的文化身份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但“宰相必用读书人”，枢密院等军事机构也由文人执掌。

中唐以来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动，人身关系的变化，兵役制度的变化等等，也得到了明确的规范。府兵制崩溃后开始的募兵制度，在宋太祖时期被明确规定为“可以利百代”的基本国策而正式得以确立。中唐以来社会结构的若干复杂变化在国家的律敕中也都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反映，如“本朝不抑兼并”的政策；如在法律上肯定了人口流动的合法性，肯定客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确认了客户出立为主户的手续等等。

上述制度在宋初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比较显著。一方面，中唐五代以来中央对地方的失控局面以及将悍臣骄的状况为之改观，“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尊京师”，“朝廷尊大，主（皇帝）势始强”，形成了两宋三百余年的“无内乱”、“无腹心之患”的安定局面；另一方面，中唐以来政治结构、生产关系的诸多变化由于得到了明确的规范，这就从更深的层次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北宋建国五六十年以后，就出现经济、文化、科技的迅猛发展，成为战

国秦汉以来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诸如“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靖难之役”、“三藩之乱”等大规模“内乱”的王朝。一般王朝常有的宦官专权、外戚干政的情形在宋代亦无显迹。“有外患而无内乱”，“三百年无内乱”，“无腹心之患”，是宋代政局的显著特点。在这种和平安定的内部环境中，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避免了干扰和中断而持续繁荣，继长增高。宋代文化的空前繁荣，与和平安定的内部环境有着极为直接的关系。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就生动地描写了东京百年安定繁庶的社会环境与宋词（“新声”）之间的关系：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
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
在庖厨。

可以说，安定繁庶的社会环境，正是宋代文化繁荣的社会基础。

不惟如此。宋代新的军政体制的逐步形成，唐末五代分裂战乱因素的逐步清除，社会的日渐安定繁庶，这样的一个过程，与宋代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日渐复兴又正是一个互为重合、互为表里的过程。著名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就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前文已述，为削弱地方藩镇的权力，宋太祖选派大批儒臣到地方任职，这一策略，从制度的层面上讲，是为了“防止唐末以来强藩割据、武夫横行的局面再度出现”，从文化的层面讲，则“正是试图通过重用儒生振兴传统文化，恢复三纲五常为律条的儒家道德伦理以重整和安定社会秩序。综观其后来在北宋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客观社会效果，尤其是如此”^①。关于这一点，古人也有很深刻的认识：

太祖皇帝起平祸乱，尽屈良、平、信、越之策，休牛马而弗用，
慨然思得诸生儒士与议太平。而鲁之学者始稍稍自奋垅亩，大裾长绅，
杂出于戎马介士之间。父老见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
方时厌乱，人思复常，故士贵。盖不待其名实加于上，下见其物色士

^① 参见陈植鄂：《北宋文化史述论》，第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类而意已悦安之，此儒之效也^①。

可见，正因为“太祖皇帝起平祸乱”，原来在乱世中被压抑的儒生才有可能“稍稍自奋于垅亩”；但另一方面，只有儒生出头，“天下太平”才能真正有望。二者的互为表里是显而易见的。

从这一角度来说，确立安定太平的社会环境，就不单单是政治家的政治事业，也是思想文化界的任务，也是一项学术文化事业。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宋代新的军政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儒学也同样开始了其复兴的过程，而复兴之初的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于《春秋》一经”。因为《春秋》中的“尊王攘夷”，恰恰符合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当时的政治与文化就是这样互为表里，于是有儒学文化的全面复兴：

艺祖造宋，首崇经术，加重儒生。列圣相承，后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间，豪杰并出。周先生奋乎千有余载之下，超然自得，建图立书，本于《易》之太极，子思子之诚，以极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蹟，而本之以中正仁义，贯显微，该体用。二程先生亲得其传，相与阐发精微，凡尧、舜、禹、汤、文、武，至于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复皎然大白于天下，使学者皆得以求端用力于斯焉。呜呼，元气之会，而天运人事之相参，乃至如此猗其盛哉！由是异人辈出，又为之推衍究极，至于朱氏、张氏，而三先生之蕴亦几于发露无余矣。由三先生而来，虽不克皆显于时，究其用，然以其嗣往圣，开来学，潜补治理，以建万世太平之源，则孔、孟氏而下未之有也^②。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汉唐时期的高度发展，至宋代开始了某种结构性的变迁。

从政治上看，一个最为深刻的变化，就是汉魏以来影响中国达数百年之久的门阀政治彻底终结。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史料中所谓“五代以还，不崇门阀”^③，“五季以来，取士不问门第，婚姻不问阀阅”^④等

① 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四，《张穆之触鳞集序》，《四库全书》本。

② 魏了翁：《鹤山大全文集》卷三十八，《成都府学三先生祠堂记》，《四库全书》本。

③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十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④ 郑樵：《通志·氏族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十通》合刻本。

等，也都准确地反映了上述变化。随着门阀政治的终结，以往那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士庶天隔”，即由世家大族世代垄断政权的局面完全改观，封建政权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这就为一般的庶族阶层，甚至更为贫寒的社会底层成员提供了较多的际会风云的机缘。前文所述的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广泛推行，正是与宋代社会关系的这样一个深刻变化有关。

在经济上，首先是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大都市的急剧增加（唐代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13个，宋代猛增到46个），城市自身发生了商业性的变化（坊市制和日中为市制被冲破），草市镇的大量涌现，手工业产品的激增（如宋代矿冶业的产量是唐代的十几倍），纸币的出现和铜钱铸造量的猛增（唐代最高年铸造额为32万贯，宋代为600万贯），区域性市场的形成等。工商经济的高度发展，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工商市民阶层，使宋代居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宋代国家税收中来自工商方面的收入也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方面的收入，预示着传统经济结构的变化。其次，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卷入到商品流通领域，土地买卖日益频繁，甚至官田亦大量被出卖，“唐宋以来，官田益少”。为适应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宋王朝实行了“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允许合法地通过买卖去兼并土地，扩充田产，发展家业，“求田问舍意最高”，私有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有了较大的空间和自由度。

与上述变化相表里的是，宋代居民的人身自由程度较前代亦大大提高，社会各阶层都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这种情况的发生，与上述土地私有制的日益深化、个体经济已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有关，也与工商经济的广泛发展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出路有关。人身自由程度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募兵制度下的“兵农分离”，使百姓较为彻底地从兵役的束缚当中摆脱出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① 其次表现为劳役征调的废止。官府于手工工业的工匠，不再征调，而是采取“和雇”即招募的方式；其他临时性的劳役，一般也由募兵制下的厢军承担。《文献通考》曰：“宋朝，凡众役多以厢军给之，罕调丁男。”

^① 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十一，《四部丛刊》本。

“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全固”^①。因为厢军都是经招募而来的，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募役制度。募兵制度、募役制度的本质就在于招募，而不是强行征调，“既曰招募，须从人愿”^②，广大的社会成员因此而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宋代的佃农与前代相比，也更加自由，以往那种半农奴性质的“部曲”制在宋代已基本被废止，佃农与田主之间只是劳动力的雇用和被雇关系，“各取稳便”，而不允许存在人身方面的奴役。

文化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精神发展的历史。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的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决定着文化发展的面貌。从上述宋代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可以看出，宋代正是一个人的自主、自信意识得以强化的时代。首先，由于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深化，诸如限田、均田、抑制土地兼并等限制土地私有权发展的措施已不复存在，土地所有者的经济自主意识大为强化。与此同时，兵役、徭役也开始由汉唐时期的强制性人身征调向募兵、雇役方向转化，人身自主意识亦因此而提高。另外，门阀制度的崩溃和科举制度与选官制度的完全合一，使得人们踏入政治舞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个人奋斗的过程。由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自然要比以往靠家族门第、察举推荐而做官平添了许多自豪感，从而催化了某种政治上的自主意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宋代政治中的“议论风起，国策难定”等等现象，都与这种政治上的自主意识的加强有关。

这种表现在经济上的、人身上的、政治上的自主意识的加强，必然会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宋儒的那种著名的“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③的怀疑精神，那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理论自信，那种“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④的自豪，无一不是宋代那种强化了的个人自主意识在文化领域中的反映。今人论宋学精神时，曾将其概括为“议论精神”、“怀疑精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六、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李觏：《李觏集》卷二十八，《寄上富枢密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④ 张载：《张子语录中》，见《张载集》，第3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点校本。